



怎么找的他们，在什么地方见的他们，他们居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也是特别想要构筑一个大的空间地理的感觉，就是这些农民进城之后，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生活。

每一个采访都有不同的感觉，比如说到青岛看我的堂叔，他在青岛生活了十几年。我的堂叔在当地的电镀厂上班，说是说青岛，但实际青岛胶东的一个村，实际上还是农村，我找了很久才找到。而且，我看到他们住的房子非常潮湿，比我们老家的房子还落后呢，我去了才发现，原来他们只是从梁庄搬到了另一个村庄，居然也离乡背井这么多年。所谓“打工”，依赖的是工业，而在梁庄，没有工业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2015年，你失去了父亲。因而写了《梁光正的光》，但为什么不再用非虚构的方式呢？

梁鸿：我觉得写我的父亲不太适合用非虚构的方式，而且他本人就是个非常戏剧化的人物。他会允许我虚构，那另一方面，我也从我父亲的形象出发来挖掘更深层的东西。比如父亲作为一个人的存在，作为一个农民的存在，作为一个男人的存在，除了父亲，他还有很多身份。我也想通过他把人性的冲突、人性的挣扎表现得更加充分一些，所以我觉得这时候虚构是更合适一些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四象》是你的第二本长篇小说，从非虚构到虚构，这种转变顺利吗？

梁鸿：我不觉得是一种转变，我写作还是百无禁忌的，我更多思考的是这个题材适合用什么样的文体。只是我觉得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适合用“非虚构”来写，而到了《梁光正的光》，他是一个高度戏剧化的存在，那我自然会用虚构的方式来创作，到了《四象》，就像我在《后记》中提到的，就好像在突然之间，听到亡灵的声音，要把亡灵的声音体现出来，那只能用非虚构的方式来写。所以从非虚构到虚构对我不构成什么转变，那时候自然而然就用两种笔法写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的父亲算不算对你影响最大的人？

梁鸿：每个人的父亲对他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。我和我的父亲的关系，早年也有很多争吵，但是总体来说，我的性格受他影响很大。我的父亲很乐观，像我们兄弟姊妹也很乐观，会自我调侃，也会面对艰难困苦，坚强地挺过去，这是我的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。我的父亲像个刺头，爱发表意见，我们也是。

其实我们的大半生，都在努力克服或者摆脱父母的影响，然后到了有一天，你才会发现，这种影响是摆脱不了的，它已深入骨髓，成为你命运的一部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韩孝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，有多重人格，他分裂成了他早前听说过的那三个人，这个人有原型吗？

梁鸿：谈不上有原型，那只有一个非常遥远的影子，我有个同学，精神有点问题，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，这个影子已经退去了，重新加入新的血液、新的相貌、新的身份。所以说原型好像也不太对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中国传统哲学里有“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，“四象”是不是也有古典哲学方面的考虑？

梁鸿：我写的时候也很怕把小说写成哲学的阐释，我怕我能力不够，另一方面，我写的并不是古典哲学本身，而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是如何在当下中国呈现出来。我想写的，是中国生活内部的思想，它是如何生成的？

重新审视乡土文学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鲁迅到莫言，你对中国乡土文学怎么看？

梁鸿：我觉得《四象》不是乡土文学，离乡土文学有点远了。现在年轻作家写乡村的确实越来越少了，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文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。现在很多青年作家写小镇生活，写在城市的打拼，这是时代变迁之后的结果，像莫言对乡村进行原生性的书写，